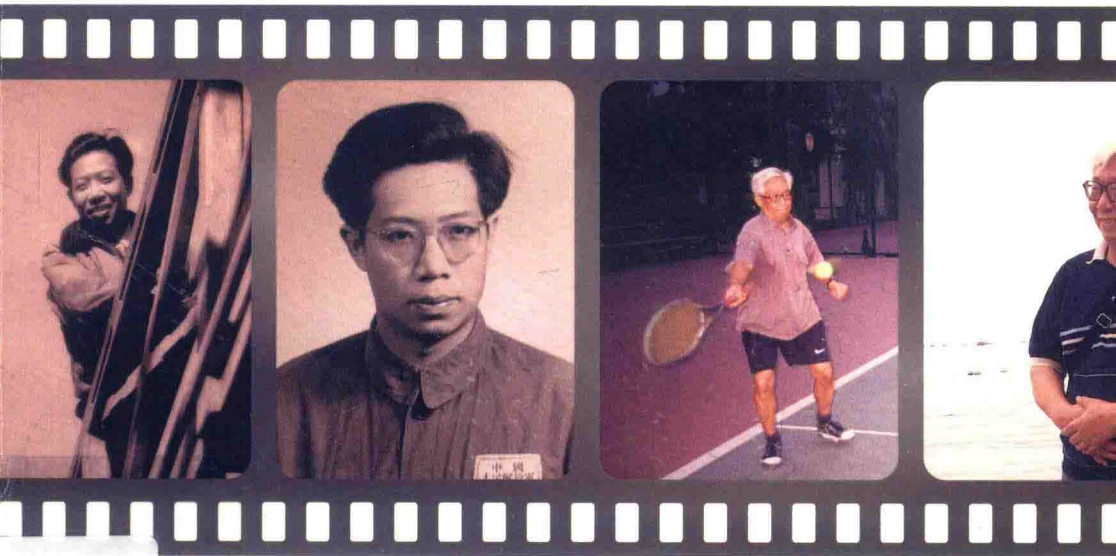




光阴的故事系列

悠悠岁月

谢刚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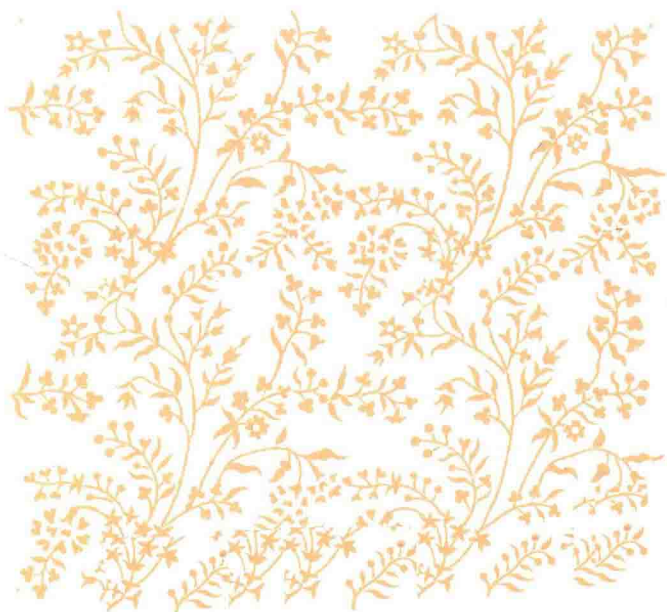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SHAN UNIVERSITY PRESS



悠悠岁月

YOUYOU SUYUE

谢刚生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悠岁月/谢刚生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0

(光阴的故事系列)

ISBN 978 - 7 - 5668 - 1901 - 7

I. ①悠… II. ①谢… III. ①谢刚生—自传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032 号

悠悠岁月

YOUYOU SUIYUE

著 者: 谢刚生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苏彩桃 黄 斯

责任校对: 李林达

责任印制: 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7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编 人生历程

| | |
|--------------------------|---------|
| 我的故乡 | (2) |
| 我的亲人 | (4) |
| 我的童年时代 | (12) |
| 在大埔中学就读的五年 | (16) |
| 转学汕头岩光中学 | (21) |
| “铁窗生活” 40 天 | (24) |
| 沪、港、穗、黔、渝、厦之旅 | (26) |
| 从组织读书会到参加革命武装 | (32) |
| 在广东省军区兴梅军分区 | (37) |
| 在华南军区军政干校和中南军区广东干校 | (39) |
| 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 | (43) |
| 转业下放北大荒劳动 | (57) |
| 初到高校工作 | (65) |
| 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一年 | (74) |
| 进修返校后的三次困扰 | (80) |
|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 (86) |
| 在下放劳动和农大被撤销期间 | (88) |
| 农大复办后至“文革”结束 | (91) |
| 拨乱反正和南调艰辛历程 | (96) |
| 在暨南大学工作的岁月 | (101) |
| 离休生活 | (115) |

下编 旅游日记

国外游

| | |
|------------------------|-------|
| 瑞士（1999年/2007年） | （132） |
| 列支敦士登公国（1999年8月） | （153） |
| 德国（2007年7月） | （155） |
| 法国（2007年8月） | （161） |
| 泰国普吉岛（2011年3月30日—4月3日） | （172） |
| 韩国（2011年7月2—6日） | （174） |
| 越南、柬埔寨（2013年12月18—23日） | （177） |

国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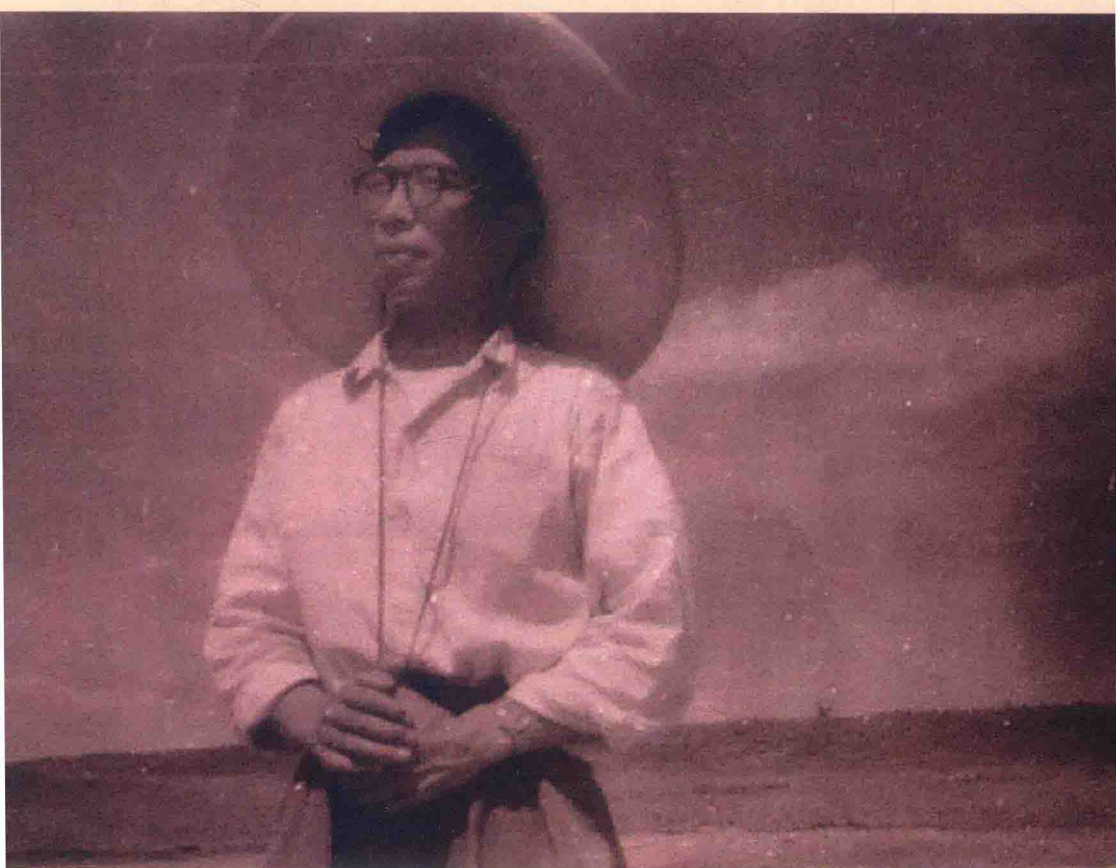
| | |
|----------------------------------|-------|
| 三次返乡行（1994年/1996年/2013年） | （179） |
| 西安、洛阳、郑州、开封（1994年10月） | （185） |
| 华东六市（1998年四五月） | （187） |
| 香港（1999年） | （193） |
| 黄山、千岛湖、杭州（2007年10月8—13日） | （195） |
| 佛山、三水（2007年11月26—30日） | （198） |
| 北京、天津（2008年9月21—29日） | （200） |
| 澳门（2009年8月13日） | （204） |
| 南昆山（2009年9月21—25日） | （209） |
| 台湾（2010年3月21—28日） | （211） |
| 湖南（2011年5月30日—6月4日） | （213） |
| 清远、肇庆、佛山（2011年7月23—28日） | （215） |
| 巴马长寿乡（2012年10月14—17日） | （217） |
| 汶川、黄龙、九寨沟、乐山、峨眉山（2012年10月22—27日） | （218） |
| 西安（2013年4月14—16日） | （220） |
| 梅州（2013年10月16—18日） | （222） |



| | |
|-----------------------------|-------|
| 东莞松山湖（2013年11月26—28日） | （224） |
| 清远（2014年12月1—3日） | （225） |
| 惠东巽寮湾（2015年11月6—8日） | （227） |
| 后 记 | （229） |

上
編

人生历程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福建省永定县的一个偏僻山区，叫磑头村（今属永定县下洋镇管辖）。

磑头村位于闽粤两省的交界处，翻过一座山，便是广东省的大埔县。这里群山环绕，山谷里流淌着一条小溪。几十户人家就住在这狭长的山谷小溪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形象地描绘了这个村子的地形：“嫁到磑头好地方，一出门楼三条岗。”这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充分展现田园风光的美丽乡村。

那时的山上长着茂密的树林和竹林，郁郁葱葱，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寂静的清晨，丛林中飘来阵阵布谷鸟的叫声，非常动听悦耳。在我们屋后山上的树丛中，春季里还长着多种稀有蘑菇（以红菇为主，其次是莲子菇、鸡肉菇等）。小时候每到蘑菇生长的季节，天刚蒙蒙亮，我便和村民们一道上山采蘑菇，一发现蘑菇，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儿时采摘蘑菇的情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还不时会梦到，可见留下的印象之深。孩子们也常到竹林里抓竹虫玩，或者去挖掘刚破土的竹笋，其乐无穷。

那时的小溪，虽然平均只有四五米宽，但水量充沛，源源不断，有的地方有一米多深，可以游泳。溪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我曾和小伙伴到溪中石缝里抓鱼，有时还帮人在溪中用石头垒起小小的拦坝，中间放置一个有入口的长圆形竹笼，让夜间逆流而上的鱼进入竹笼里，第二天天亮去收回竹笼，常常会有喜人的收获。偶尔也有村人在夜间点着火把用铁叉叉鱼。有位邻居有一张小鱼网，常在午饭前到小溪去撒几次网，这样午饭就可美餐一顿，令我们煞是羡慕。

那时村里小路的两旁，野花丛生，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枝头还有随手可摘到的野生果子，在稍高处的灌木林中，时常会有小鸟伴随着唧唧声飞来迎接你。

村人住的都是自己动手建造的土楼，这种土楼是用木桩把三合土一层一层地夯实而建成的，冬暖夏凉。土楼中间是天井，天井上下边的厅堂是合住的几户人家用膳的地方。每幢土楼的门前，一般都有一块不大的门坪，割禾



季节铺上竹席用来晾晒谷物（放暑假时我们会帮母亲翻晒稻谷），平时是老人休闲、小孩嬉戏之地。而在夏季夜间，大人和小孩往往会聚集在这里乘凉、闲聊，孩子们还会望着夜光中如群星闪烁的萤火虫唱起儿歌。当月亮高挂在天空中时，孩子们更会高声朗诵起：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未开花，摘来送公爹；公爹未起（床），摘来送阿姊；阿姊未梳头，摘来喂黄牛；黄牛跌落溪，水牛来拔尾；牛子跌落井，牛妈来救命；牛子救出井，大家笑半命。^①

然而，这诗情画意般的秀丽风光，并没有使村人摆脱贫困。村子小，人口虽不多，但耕地也很少，且多是梯田，更重要的是这本来不多的耕地，在旧社会还有不少是属于邻村地主的所谓“祖尝田”。每逢收获季节，他们的子孙便会成群结队、耀武扬威地前来收租，对稻谷的质量百般挑剔，租种的人家还得忍气吞声地请这些收租者大吃大喝一顿。村民交租之后所剩无几，生活自然也十分困难。因此，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被迫漂洋过海到南洋（主要是马来西亚）去谋生。我父亲四兄弟就有三个去了马来西亚。而留下的人披星戴月，一年到头，不得温饱。因此有的村人上山砍柴或砍竹做些日用品，挑到邻近的下洋镇、中川乡去卖，以此帮补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村人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使这里的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林、竹林被砍伐一空，山不清水不秀了，水流也小了，更难听到鸟语、闻到花香了，粮食的产量不高，发展副业的路子又被阻断，村人的生活仍处于贫困之中。1978年以来，党中央大力拨乱反正，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个村子的山又渐渐绿起来了，水也渐渐清起来了，又修了进村的小公路，村人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

^① 这是客家民谣，要用客家话来朗诵才能押韵。

我的亲人

我的父亲原名谢豪朝，后来还使用过两个名字——谢汉琴、谢海涛。他出生于一个主要靠打铁为生的贫困家庭（先祖父以上五代主要是外出到广东省丰顺县沙田圩一村庄打铁，当地尚有曾祖父辈坟墓，1939年春节期间，我曾随同父亲和伯父等前往祭扫）。

由于家贫，我父亲断断续续只念过不到三年的书，打过铁、烧过炭、耕过田、做过泥水匠。他因有些天资，又勤奋好学，为乡亲所赏识，资助其前往马来西亚谋生。在马来西亚，父亲当过矿工，做过学徒。一次，因与恃强凌弱的日本人发生争执，父亲有理反被抓去坐牢。他深感国弱受欺，加上爱看进步报刊，受到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遂于1917年左右，毅然回国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所在的部队属于粤军，曾任副官、团附等职，在闽粤一带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打过仗（当地群众称为“南北兵”交战），负过伤。大概是1923年进军永定时，他曾做过约一个月的代理县长（当时战事处于拉锯状态，任职时间不可能很长）。后来，他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成员，参加北伐战争。攻克武汉后，他在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任过“永绥”等舰的舰长、沪汉运输局主任等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时，在武汉的永定同乡、共产党人卢肇西等曾相邀参加武装斗争，他因有家小拖累，未能应邀，从此转往江西九江经商，主要销售永定的特产条丝烟（供吸水烟筒者专用）。1938年，日寇侵临九江时，他宁愿抛弃财产逃难回乡，也不愿当亡国奴。回到家乡后，他向亲友借贷，奔波于永定、大埔一带，做些小本生意，勉强维生。1944年，他与友人合股在当时的埔县城（茶阳）开设经营永定烟叶、土纸的“致中和”店，1947年还在汕头开设类似分店“致昌行”，直到解放后才歇业。

由于我父亲在异国深感国弱受欺，“九一八”事变又进一步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他有两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我父亲在九江经商时。一件是对还是孩童的我们兄弟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那时我才三四岁，耀崇哥六七岁，身穿儿童军服，腰扎儿童武装带，臂挂写有“抗日救国”的袖标，雄赳赳、气昂昂地由父亲领着我们到一家照



相馆拍下了一张充满爱国激情打扮的照片，途中曾遇到日本水兵，父亲领着我们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另一件是为了抗日救国，他曾扶持邻村同姓的两位有为青年报考空军学校和陆军学校，并为他们取名为“中柱”和“中枢”，希望他们能成为抗日救国的栋梁之材。后来，谢中柱在学习飞行时失事，壮志未酬身先死；谢中枢1943年（时任中校副团长）在湖南常德指挥部队与日寇英勇作战时，壮烈牺牲。

我父亲在政治上向来较开明，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情、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多年来一直是共产党的朋友。1939年父亲参与了永定县私立侨育中学（以下简称“侨中”）的创办，是该校的常务校董。侨中创办后，中共闽西南特委把它当作一个据点，先后派遣钟骞（又名郑坚，后任中共闽西南特委副书记）、邱秉经（又名邱长庆，20世纪70年代任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等人到侨中担任领导，并负责侨中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我父亲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以侨中是“赤色干部学校”为由，悍然下令查封侨中。在此关键时刻，父亲和其他校董一同为侨中的生存和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侨中地下党负责人邱秉经、丁立明、胡以按等在1981年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侨育中学》一文，就提到我父亲等侨中校董“对侨中作出一定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资助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对我们兄弟参加革命也给予积极支持。大埔解放初期，军管会副主任卓禹轮曾在一次大会上表扬过父亲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

1949年夏，国民党胡璉兵团南甯途经大埔时，有坏人向敌密告父亲支持共产党，敌人要抓父亲，幸亏党组织已先通知父亲逃离。敌人未能抓到，便要放火烧毁“致中和”店铺，后被左右邻舍以会殃及他们店铺为由所劝阻。

我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学，但他酷爱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因而有较渊博的知识。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文章诗词也写得不错，被誉为自学成才的“儒商”。



祖父



父亲

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地方有关部门竟因我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我父亲当作“历史反革命”来看待，被判管制2年，“致中和”店铺也被当作“官僚资本财产”而被没收，成分则被划定为“工商业兼地主”（“工商业”与“官僚资本”是性质不同的概念，当时却无人加以区分，至于定为“兼地主”也是缺乏事实与政策依据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鉴于父亲在回国后长期在永定、大埔一带的华侨中有一定影响，曾请他做争取侨汇的工作，并出任永定县侨联委员，他为此尽了自己的努力。他还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过中共龙岩地委统战部召开的有关会议。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不断地遭到批斗，在1974年被迫害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我父亲也在1985年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1953年的错误判决被撤销，“致中和”店铺归还家属，我父亲的成分也由“工商业兼地主”改为“华侨工商业”）。

我母亲叫黄阿带，出身贫困，目不识丁，也没听说她有兄弟姐妹，很可能是个孤儿。她性格内向，平时话很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农村辛勤耕作，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记得我们从九江逃难回乡后的头一两年，家里主要靠种地为生，母亲起早贪黑地干活，有点支撑不住，希望耀中哥能在农村找个老婆帮她分担一些劳务，孝顺母亲的耀中哥只得违心地遵从母命。

母亲为人纯朴厚道，安分守己，从不惹是生非、与人争吵，和乡亲、邻居相处甚是融洽。对生活、对儿女的未来，从不抱奢望。记得我八岁的时候，有一次裁缝师傅进村来为村人做衣服，她对裁缝职业很羡慕，深情地对我说：“以后你长大了，能做个裁缝师傅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干这种活可以避开风吹雨淋日晒，没有耕田种地那么辛苦。”这就是她对我的教育和期望。

母亲一生任劳任怨，勤俭持家，既关爱儿女，又不溺爱儿女。记得在九江时，有一年我们兄弟在离家较远的一所小学上学，早出晚归，午饭则由母亲在家做好，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步行送到学校，好让我们能在午间多休息一会。还记得我十岁的时候，在邻村侨育中学寄宿上学。那时学生每人备有草编的饭袋，自己把米放在饭袋里交给学校厨房用大锅煮熟，而菜则要自己做



母亲



(有时是自己买一些晒干的萝卜丝，在厨房架起两块砖石，捡些柴禾煲来吃)。一次菜吃完了，我一个人走回家里，想让母亲为我做点咸菜带到学校吃，不巧母亲在较远处干活，我只好自己动手炒咸菜。当我盛满一汤匙猪油正要放进锅里时，母亲干活回来看见了，有点责备地说：“用这么多猪油来炒菜呀！”(那时炒一次咸菜，我一般要吃五六天，用一汤匙猪油已是很少的了)。但当我要返回学校时，母亲撂下农活，怜爱地送我走过一段荒无人烟的山路后自己才回家。

1950年至1960年，母亲到耀中哥家带孙子、孙女并帮忙做家务。耀中哥病逝后，她被那时还是单身的耀崇哥接去同住并帮忙做家务，直至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被有关部门勒令回家乡劳动，1971年病逝于家乡。

总之，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年届古稀，她还能挑一担水)，是朴实无华、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的一生。她养育了我。然而，这养育之恩，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未尽到回报的责任。至于我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也同样没能回报，这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我在家里最小，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大哥谢耀萱，在我出生后便去世了，大概只活了十几岁。

二哥谢耀中，汕头聿怀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法学院，“八一三”事变后转学到武汉大学就读。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是学运领导人之一。一次同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他被刺伤了手。当时在武汉，有不少青年学生投奔延安，他函告父亲，拟往延安到敌后打游击。当时九江正面临日寇入侵，父亲因还需留下处理经商业务，不能带我们立即逃难回乡，于是就做耀中哥的工作，要他先护送我们逃难回乡。回到家乡后，他曾受聘为下洋犹兴小学的代理校长。由于他为学校订的唯一报纸便是中共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被疑为“赤色分子”。他还在村里自费办起了夜校，亲自为乡亲们授课。1939年，他转学到迁徙于韶关坪石的中山大学就读，之后又随中大迁至云南，读至毕业。在即将毕业时，他接受器重他的一位教授的劝告，为能找到工作而加入了国民党，并由该教授推荐给曾任中大校长的朱家骅，经朱安排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主办的《组织旬刊》当编辑。其后还到西安范汉杰部做事。抗战胜利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秘书。1946年，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美洲华侨教育考察团去了美国。考察结束后，他留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1947年夏，我和耀崇哥在汕头被国民党当局以“政治嫌疑犯”的名义拘捕入狱，他回国参加营救我们的工作。我们出狱后，他先在汕头南华学院，后到厦门大学任代教授。厦门解放后，他被派到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调至福建师范学院任教，直至1960



我与母亲和耀崇哥（右一）

年病逝。耀中哥对母亲极为孝顺，记得我们从九江逃难回到家乡时，他看到母亲到溪边挑水便抢着接过扁担水桶挑回家。他对我们兄弟也很关怀，如他在昆明就读中大时，曾托我一表兄捎回给我和耀崇哥每人一双皮鞋；他去美国时，把其自用的相机托人捎回给我，又特地买了一支 Evershap 钢笔给我；从美国回到汕头时，他给父母和我以及姐姐买了不少衣服和布料。



后排左一为耀中哥，左二为慧文嫂，左三为耀崇哥。前排左一为耀中哥之女琳琳，左二为母亲，左三为耀中哥之子仁超



三兄弟，左一为耀崇哥，中间为耀中哥，右一为我

三哥谢耀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谢方生，我参加革命后也仿之改名为谢刚生），1945年大埔中学毕业后考入时在龙川的国民大学，1946年春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就读，曾是该校中共地下党学运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是1947年5月31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示威游行的副总指挥（生前写有30万字的《南国海燕——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纪实》的文稿，后由他当年的老战友整理、校订，2007年5月印刷出版）。1947年9月，他在汕头被拘捕后转到国民党广州行辕关押，于1948年2月保释出狱。随即奉地下党组织指示，转移到香港一渔岛小学任教至1948年夏，又被派往闽粤赣边区打游击。解放后，曾任龙岩军管会秘书科长。其后屡经坎坷，于1956年调福州，先后在福建省科委、福建省司法厅工作，最后的职务是福建省法学会秘书长。1988年离休，2006年5月病逝。



秀英姐一家

大姐谢秀英，出生后不久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但幼小的尚未完

婚的“丈夫”没过几年便病逝了，她留在婆家生活、劳动，直到1937年冬我们从九江逃难回家，她才回到娘家居住。1938年，经媒人介绍，嫁给邻村当时在缅甸经商的丈夫。大姐出嫁时的情景，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母亲和我陪着她步行约三里路到达她婆家，没有花轿，没有陪嫁，也没有什么婚礼，婆家托了几个亲友来迎接我们，吃了一顿饭，留下秀英姐，母亲和我又回到了磔头。此情此景，令人酸楚。后有南洋水客来，把秀英姐带到缅甸与丈夫完婚，从此当起家庭主妇，约在2003年前后病逝于缅甸。

二姐谢兰英，也是出生后不久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约在1946年嫁到大埔恋墩，长期在乡下务农。1985年父亲的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后，收回了“致中和”店铺，她和姐夫于数年后迁到该店铺居住至今。



兰英姐一家

我的妻子茅英琪，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我们相识于1956年10月。当时我在山东潍坊军委总后勤部第一预备学校工作，到上海去采购图书，同事潘钊芝的妻子吴静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经由她介绍，我认识了其同学茅英琪，由此开始了我和英琪的恋爱，并迅速于1957年1月在山东潍坊军委总后勤部第一预校完婚。妻子毕业后分配到上海陆行中学任教。1962年春调至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外语教研组工作。1980年随我南调至广州，分配到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直至退休，2006年病逝。



我和英琪的结婚照

我的大女儿谢东，生于1959年，原工作单位暨南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从事撰稿、编导、配音工作。

我的二女儿谢珉，生于1962年，1987年与女婿魏青赴瑞士苏黎世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谢珉留校，从事试管婴儿的科研工作，魏青则在瑞士联合银行（UBS）从事计算机工作。

我的三女儿谢青，生于1972年，现在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并在职攻读博士。



2001年全家福